

新型“二元社会”结构下社会保障 促进流动人口消费了吗？

孟 雪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在最小二乘回归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基础上进行Oaxaca-Blinder分解与Quantile分解,考察在新型“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出现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均会抑制消费,并且在不同消费层次上抑制作用有显著差异;同时,群体内部消费差异显著,并且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消费差距越来越明显,其中群体间特征差异是造成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随消费差距的扩大,特征差异的影响逐渐加深。若要提高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缩小群体间消费差距,应进一步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加强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同时注意加强农民工群体的能力素质培养,提高自身禀赋水平,在此基础上加快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关键词:流动人口;消费差距;社会保障;分位数回归;差异分解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98(2023)02-0028-16

一、引言

21世纪以前,死亡与生育是影响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进入新世纪以来,人口迁移流动取而代之,流动人口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年增加,并且在相同时期内流动人口的增加速度远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是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对于中国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伴随着人口大规模迁移,使得原有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现阶段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无论在流入地还是流出地,家庭年龄结构均改变,使得流出地家庭的少儿、老年抚养比显著提高,从而产生流出地少儿教育以及养老问题;第二,由于流动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与市民相同保障水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保障与公共服务较难实现,因此出现了农民工“城市边缘化”群体,并存在着流动人口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小、城乡险种对接受阻、跨区域报销困难等问题。加之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建立在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是以户籍或居住地为基础,而对于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保障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所以说流动者在流动过程中面临着多种风险以及不确定性。社会保障作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他们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公平享有,然而现阶段流动人口群体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会制约群体消费水平。

近年来,虽然流动人口的就业环境获得了改善,收入水平也显著提升,然而由于群体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且无法享受与市民平等的权利和社会福利保障,所以很难实现与市民同样的消费水平,其消费潜力一直未被充分释放。当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时,将会导致国民总体消费率下降,消费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而内需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最重要制约。所以,释放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消费潜力,是扩大内需政策实施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王亚菲,2022)^[1]。鉴于此,对流动人口的消费与社

收稿日期:2022-05-10

基金项目: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企业基础研究:知识溢出与创新效率”(2021CXB025)

作者简介:孟 雪(1996—),女,汉族,山东禹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应用微观经济学。

会保障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研究表明,城乡发展差异、制度因素形成了我国“人口迁移谜题”(王秀芝和孙妍,2018)^[2]。由人口结构大规模变迁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一方面表现为流动人口群体消费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表现为由于流动人口户籍制度制约产生群体间城乡差异分化。目前,针对流动人口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国外学者主要集中于对流动人口收入报酬以及社会地位与福利获得等方面的研究。(1)收入报酬存在显著差异。不仅表现在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也存在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Meng X.,2019)^[3]。由于农民工素质技能的有限性,流动人口的城乡户籍禀赋特征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被制度性分割,导致群体内部存在“城乡差异”分化,加之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产生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新型“二元社会”。(2)社会保障因素影响消费。一方面,由于城市人口单独享有就业、福利等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机会待遇的优势,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显著低于城市居民(Huang Y et al.,2020)^[4]。另一方面,城市劳动力市场内部管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城乡分割体制,产生群体内部福利差距(Smyth R et al.,2009)^[5]。社会保障等福利的获得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可支配收入,流动人口不仅与居民存在收入报酬异质性,收入差距在群体内部也依然存在。因此,流动人口个体的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潜力有待释放(Chen et al.,2015;Chen,2018)^[6-7]。

针对我国流动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迁移的事实,国内学者在对此类群体进行研究时得出与国外学者大致相同的结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流动人口消费进行展开分析。(1)收入报酬存在显著差异产生消费分层。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存在“城乡差异”分化(王美艳,2005;杨菊华,2011;于潇等,2022)^[8-10],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也不断发育成熟,然而户籍制度分割劳动力市场成为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第一大障碍,农民工通常处于“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地位,使得群体内部收入报酬差距显著,那么户籍差异流动人口是否存在收入分层,若真实存在是否将导致消费分层?于潇和孙悦(2017)^[11]的研究中验证了户籍歧视在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消费与收入差距中真实存在,并且农民工从低收入阶层向高消费阶层转换的过程中,户籍歧视产生的收入差距从30.52%上升至75.14%。(2)流动人口缺乏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制约群体消费水平的发展。首先,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面临众多风险,但在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下并未达到减少流动者风险的作用,对于不同身份的流动人口均存在社会保障待遇的相对弱势;对外来市民而言,由于流入地许多福利针对户籍居民,所以其较难获得与本地居民相同水平的社会保障待遇。其次,农民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既受户籍歧视的影响,又存在自身教育水平低、缺乏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因此农民工较难获得养老、医疗等城镇职工所享有的社会保障(郭菲和张展新,2012)^[12],总之,无论是外来市民还是农民工均存在较低水平的受保障程度。郝演苏等(2022)^[13]认为,提升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释放其消费潜力。再次,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在近几年不断改革发展,但该制度的地方管理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户籍制度与统账结合制度中的转移支付是导致流动人口受保障程度偏低的最主要原因(邓大松和胡宏伟,2007)^[14]。社会保障是解决居民消费瓶颈的主要手段(范黎波等,2017)^[15]。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作为主要部分,社会保险虽然实行统账结合的资金管理制度,但是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只有个人账户资金可以随流动人口流动,而不能带走单位所支付的费用,因此流动人口的参保热情大大降低(杨菊华,2011)^[16],即使农民工参加了社会保险,但在一些城市中仍会出现退保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农民工自身的流动性特征与社会保障的地方统筹二者之间的矛盾(张展新等,2007)^[17]。整体而言,流动人口群体在参加社会保障方面既存在禀赋、身份的制约又会遇到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阻碍,而参加社会保障作为流动人口规避风险的一种方式势必会对消费产生直接影响。最后,流动人口消费影响因素还包括流动者的个人禀赋特征、流动特征以及就业单位特征等。

在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为更好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准确把握流动人口新变化,现有研究认为,劳动力流动有助于降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发生概率(樊士德和费振东,2021)^[18]。已有文献集中于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报酬差异(Gary S. Becker,1957;王美艳,2005)^[19-20]、社会保障现状(张展新等,2007;秦立建等,2015)^[21-22]等的探讨,而缺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与消费关联性的研究。基于此,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展开:第一,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因为受到户籍条件的制约,从而产生消费、社会保障差异;第二,若真实存在消费差距,其影响机制的表现形式是什么;第三,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是否会刺激

消费提升;第四,在不同消费分布区间群体内部消费与社会保障之间的传导机制又有何差异。

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先引入可能影响消费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后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回归,考察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影响程度。为了对流动人口内部差异进行分解,基于 Mincer 工资方程对消费差异进行 Oaxaca - Blinder 分解展开研究,同时运用 Quantile 分解方法比较不同消费层次上两群体的消费差异,并探究户籍差异与禀赋差异对群体内部消费差异的贡献率,为缩小两群体消费差距提供理论数据参考,最终达到提高流动人口整体消费水平的目的。

三、消费差距数据及特征事实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

数据来源于国家卫健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该数据的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15 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此次共调查约 16.9 万个样本,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剔除被访者“不清楚”是否参加社会保险的样本,并剔除其他变量的无效样本,最终得到 130036 组有效数据,其中参加社会保险^①的流动人口达 120686 人,仅有 9350 人未参加社会保险。

选取人均月消费支出^②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为核心解释变量,在问卷中涉及“是否参加城乡养老、城乡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等,通过统计计算得出受访者是否参加社会保险;除此之外用人均月收入^③的对数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为避免方程中消费弹性被高估,将可能影响消费的其他控制变量纳入方程中,控制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性别以及年龄代际^④等自然特征,居注意愿、流动范围、流动时间^⑤等流动特征;除此之外考虑到劳动力市场上职业、行业分割,因此将单位性质^⑥、产业类型^⑦与就业身份等工作特征纳入方程中。

表 1 报告了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并衡量城乡户籍流动人口的消费、收入均值之差,分析二者差值所占农民工消费、收入水平的比例。总样本平均消费支出和收入分别为 1754 元、3524 元,平均消费倾向为 49.77%;城乡户籍流动人口支出水平存在明显差距,消费支出分别为 2246 元、1669 元,农民工的消费支出相当于外来市民的 74.31%,收入分别为 4516 元、3352 元,绝对收入差距为 1164 元,高于农民工收入 0.35 倍。

从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看,流动人口整体以及各群体均有较高的参保率,相比而言农民工参保率略高。图 1 具体描述了不同身份人群分项社会保险参加情况,除医疗保险外,其他三类保险均是外来市民的参保积极性较强,可看出农民工更注重医疗这类基础保障性保险。其中城乡籍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率分别为 68.8%、54.1%;医疗保险参与率分别为 82.2%、90.8%;参加失业保险与工伤保险的流动人口意愿较弱,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保险参与率分别为 17%、20.4%;外来市民为 48.2%、49.1%,由于外来市民就业单位与就业条件相对优越,因此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与度更高。

全样本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2 年,接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集中分布在初中学历,整体来说受教育程度偏低;外来市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3.02 年,学历水平基本在初、高中以及大学学历均匀分布,在这四个分组中均达到 20% 以上的比例;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外来市民低 3.277 年,可视为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外来市民低一个等级,拥有初中学历的农民工比例达到 52.8%,只有极少数的农民工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除此之外,大多数受访者已婚;男性流动人口数量略高于女性;第一代流动人口所占比例略高于新生代流动人口,并且农民工相对于外来市民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较多,可能的原因是农民工相对来

① 在本文的分析中认为流动人口参加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任何一项社会保险即视为被访者已参保。

② 人均消费支出 = 家庭每月总支出 / 流入地家庭规模。

③ 人均月收入 = 家庭每月总收入 / 流入地家庭规模。

④ 根据王东、秦伟(2002 年)对农民工群体的划分,将第一代农民工划分为 1980 年之前出生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也可称为第二代农民工)指 1980 年之后出生的群体,根据划分以 1980 年为界本文将流动人口群体划分为第一代流动人口与新生代流动人口。

⑤ 选择问卷中分组数据的中位数作为流动人口流动时间进行统计。

⑥ 根据孟凡强、邓宝国(2014 年)对单位性质的划分,将就业单位划分为国有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集体企业、股份/联营企业、港澳台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社团/民办组织、其他)与无单位(样本数据中无单位工作者为零)。

⑦ 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制造、电煤水热生产供应、建筑;第三产业包括批发零售、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住宿餐饮、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科研和技术服务、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体和娱乐、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

说在户籍地工作稳定性较差,需要到城市寻求工作岗位的意愿更强烈。

总体来看,流动人口本地长期居住意愿强烈,最新区域性调查显示,部分流动人口明确表示年老时会定居在流入地,使以往流动人口年轻时出来打工、中老年后回老家生活的模式被打破^①。根据统计数据,外来市民相较于农民工拥有更高的长期居住意愿,一般来说拥有较高学历的外来市民比农民工享有更高水平的工资,会降低外来市民的流动意愿,使其更加倾向于在流入地长期居住,而农民工一般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不稳定,除此之外考虑到户籍与经济因素提高了农民工的定居难度,因此农民工居住意愿会相对较弱;从流动范围看,接近一半的流动人口选择跨省流动;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在5~9年组分布较为集中,且农民工的平均流动时间略高。

流动人口自身的高度流动性以及拥有较低的学历水平,导致流动人口工作较不稳定,因此仅有少数流动人口参加工作的单位性质为国有部门,并且外来流动人口占据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前往城镇寻找工作的过程中,主要从事第三产业,并且主要以雇员身份参加工作。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全国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城-乡差额
基本特征	样本数		130050	19144	110906	
	人均消费	连续变量,个人月支出	1754	2246	1669	577
	对数人均消费	连续变量,对数个人月支出	7.136	7.366	7.096	0.270
	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个人月收入	3524	4516	3352	1164
	对数人均收入	连续变量,对数个人月收入	7.842	8.04	7.808	0.232
	户籍	虚拟变量:农业户籍=1,非农业户籍=0	85.3%			
自然特征	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虚拟变量:参加=1,不参加=0	92.8%	88.9%	93.5%	-4.6%
		连续变量,受教育程度	10.220	13.020	9.743	3.277
		<小学(0年)	1.41%	0.3%	1.6%	-1.3%
		小学(6年)	12.07%	2.5%	13.7%	-11.2%
		初中(9年)	48.10%	20.8%	52.8%	-32.0%
	受教育年限	高中(12年)	22.34%	26.6%	21.6%	5.0%
		专科(15年)	9.75%	23.9%	7.3%	16.6%
		本科(16年)	5.85%	23.1%	2.9%	20.2%
		≥研究生(19年)	0.49%	2.8%	0.1%	2.7%
	婚姻状况	虚拟变量:已婚=1,其他=0	80.7%	79.6%	80.9%	-1.3%
流动特征	性别	虚拟变量:男=1,女=0	57.5%	56.2%	57.8%	-1.6%
	年龄/代际	虚拟变量:第一代=1,新生代=0	54.1%	56.2%	53.7%	2.5%
	本地长期居住意愿	虚拟变量:愿意=1,否=0	60.6%	73.1%	58.5%	14.6%
	流动范围	虚拟变量				
	跨省	参照组	49.2%	48.4%	49.3%	-0.9%
	省内跨市	省内跨市=1,其他=0	33.8%	35.4%	33.6%	1.8%
	市内跨县	市内跨县=1,其他=0	17.0%	16.2%	17.1%	-0.9%
	流动时间	连续变量	7.172	6.869	7.224	-0.355
		<1年	9.1%	8.6%	9.2%	-0.6%
		1~2年	17.8%	17.9%	17.8%	0.1%
流动特征		3~4年	17.7%	18.5%	17.6%	1.0%
		5~9年	28.7%	30.4%	28.4%	2.1%
		10~14年	14.3%	14.2%	14.3%	-0.2%
		15~19年	7.9%	7.1%	8.1%	-1.0%
		20~29年	4.2%	3.0%	4.4%	-1.5%
		≥30年	0.3%	0.4%	0.3%	0.1%

① 引自中国经济网《更好把握流动人口新趋势》,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805/03/t20180503_29013788.shtml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全国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城 - 乡差额
工作特征	单位性质	虚拟变量:国有部门 = 1,非国有部门 = 0	7.2%	18.5%	5.3%	13.2%
	产业类型	虚拟变量				
	第一产业	参照组	2.5%	1.5%	2.7%	-1.2%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 = 1,其他产业 = 0	26.2%	20.4%	27.2%	-6.8%
	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 = 1,其他产业 = 0	71.2%	78.1%	70.1%	8.0%
	就业身份	虚拟变量				
	雇员	参照组	56.8%	68.4%	54.8%	13.6%
	雇主	雇主 = 1,其他身份 = 0	8.8%	9.4%	8.7%	0.8%
	自营劳动者	自营劳动者 = 1,其他身份 = 0	32.6%	19.8%	34.8%	-15.0%
	其他	其他 = 1,其他身份 = 0	1.8%	2.3%	1.8%	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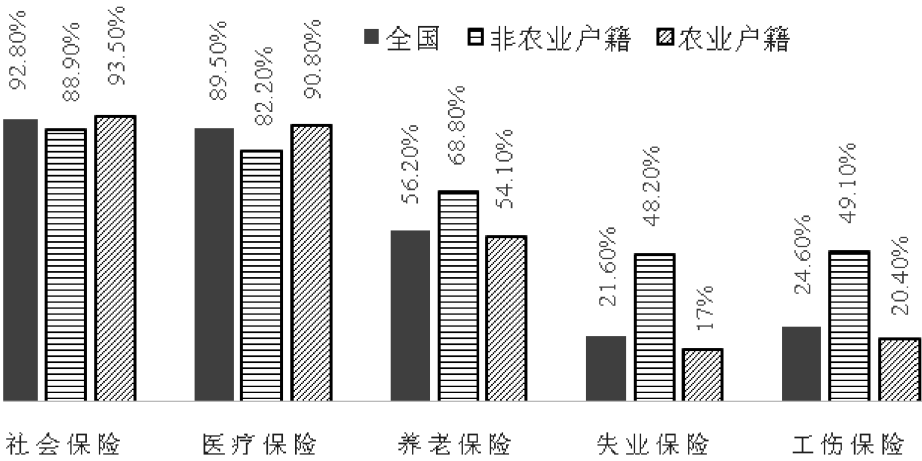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身份人群分项社会保险参加情况

(二) 不同消费层次流动人口消费现状

表 2 通过描述各群体平均消费差异和几个具有代表性分位点上的消费差异,可看出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两群体消费差距波动性扩大,并且在 0.10 分位点差距最小,0.90 分位点差距最大,因此高消费层次构成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消费差距的主体;同时,根据不同户籍流动人口高消费层次与低消费层次消费差值可看出,农民工消费分布集中程度高于外来市民。通过表 2 可知,单纯分析平均消费差距会掩盖消费分布区间上消费差距不对称现象,即消费分布在顶端差距大,末端差距小。

表 2 城乡户籍流动人口消费分布

	全国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城 - 乡差额
平均值	7.136	7.366	7.096	0.270
0.10 分位点	6.215	6.354	6.215	0.140
0.25 分位点	6.620	6.908	6.551	0.357
0.50 分位点	7.131	7.313	7.062	0.251
0.75 分位点	7.601	7.937	7.601	0.336
0.90 分位点	8.161	8.517	8.112	0.405
0.90 分位点与 0.10 分位点差值	1.945911	2.162823	1.89712	

四、模型构建与方法

(一) 最小二乘估计

1. 均值回归基础模型

$$\ln c = \alpha + \beta \ln y + \gamma \text{sec} + \eta X + \varepsilon \quad (1)$$

式(1)中, $\ln c$ 为对数人均消费支出, $\ln y$ 代表对数人均收入; sec 代表受访者是否参加社会保险; X 为控制变量, 通过控制消费的可能影响因素, 研究流动人口参保情况对消费的影响机理, 主要包括被调查对象的人口特征、流动特征以及工作特征等; ε 为随机误差项; α 代表自发消费水平, β 、 γ 、 η 分别代表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2. 均值回归扩展模型——含交叉项

$$\ln c = \alpha + \beta \ln y + \gamma \text{sec} + \lambda \cdot \text{sec} \cdot \ln y + \eta X + \varepsilon \quad (2)$$

式(2)中, 加入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与收入变量的交叉项, 考察参保情况对消费弹性是否产生显著影响, 若 λ 为正则说明参保个体消费弹性更高。将 $\ln c$ 对 $\ln y$ 求偏导得到 $(\beta + \lambda \cdot \text{sec})$, 若 β 、 λ 均为正, 则说明在任何收入水平上, 参保群体的消费弹性均高于未参保群体; 若 β 、 λ 均为负, 则说明在任何收入水平上不参加社会保险群体的消费弹性略高; 若 β 、 λ 一正一负, 说明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弹性的影响取决于收入水平的高低。

(二) 分位数回归

单纯分析平均消费会掩盖在不同消费层次上消费差距可能会存在的不对称现象, 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考察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 流动人口消费决定机制及群体内部消费差异, 即各影响因素是否因消费层次的划分而存在影响差异。根据研究对象, 将分位数回归模型设定为:

$$Q_{i\theta}(\ln c_i | X_i) = X_i \cdot \beta_{i\theta} + \mu_{i\theta} \quad (3)$$

式(3)中, i 表示不同群体, X_i 为第 i 群体的消费影响因素, $\beta_{i\theta}$ 为 i 群体的消费支出在第 θ 分位数上的回归系数, $Q_{i\theta}(\ln c_i | X_i)$ 表示给定解释变量 X 下第 i 个群体的被解释变量 $\ln c$ 在第 θ 个分位数的值。为了考察不同群体间消费的差异性, 分别估计城乡两类户籍流动人口群体的消费方程:

$$\begin{aligned} \ln c_u &= X_u \cdot \beta_u + \omega \\ \ln c_r &= X_r \cdot \beta_r + v \end{aligned} \quad (4)$$

式(4)中, $i = u$ 与 r 分别代表外来市民与农民工, $\ln c_u$ 与 $\ln c_r$ 分别表示城乡户籍流动人口的消费对数水平, X 表示消费方程的影响因素, β_u 与 β_r 分别表示两个群体的回归系数。

(三) 消费差异分解

1. Oaxaca - Blinder 分解。在进行分位数分解之前, 先在 OLS 回归的基础上进行 Oaxaca - Blinder 分解, 考察两群体间被解释变量均值的差异, 基于 Oaxaca (1973)^[23] 提出的分解方法, 将城乡户籍流动人口消费差异划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消费差距中能被方程中解释变量的数值差异所解释的部分, 是由于两群体的个人禀赋差距所导致, 将这部分差异称为特征效应差异; 另一部分是具有相同禀赋特征的两个群体由于市场因素、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消费能力不同导致的消费弹性差距, 所形成的这部分差异称为系数效应差异, 也称为不可解释部分。根据式(4)将消费差异分解为:

$$\ln c_u - \ln c_r = (X_u - X_r) \cdot \beta_r + (\beta_u - \beta_r) \cdot X_u \quad (5)$$

式(5)中, 等号左边即为城乡流动人口消费总差异, 等号右边第一项即为特征差异(可解释部分), 第二项即为系数差异(不可解释部分)。

2. Quantile 分解。建立在分位数回归基础上的 Quantile 分解方法可以考察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差异, 本文进一步通过分位数分解方法, 对两群体的不同消费层次差异进行分解。因此城乡流动人口消费支出的条件分布可分解为:

$$\Delta_{\theta} = Q_{\theta}(\ln c_u) - Q_{\theta}(\ln c_r) = [Q_{\theta}(\ln c_u) - Q_{\theta}(\ln c_{u-r})] + [Q_{\theta}(\ln c_{u-r}) - Q_{\theta}(\ln c_r)] \quad (6)$$

式(6)中, Δ_{θ} 表示在第 θ 分位数上两群体间的消费差距, $Q_{\theta}(\ln C_u)$ 与 $Q_{\theta}(\ln C_r)$ 分别表示外来市民 u 群体和农民工 r 群体在 θ 分位数上的消费对数水平, $Q_{\theta}(\ln C_{u-r})$ 则表示反事实的消费条件分布, 其含义是农民工按照外来市民的消费弹性而进行的消费情况。等号右边第一项为系数差异, 第二项为特征差异。

五、实证分析

(一) 最小二乘估计

1. 基础模型回归分析。表3中模型(1)~模型(3)分别报告了全国整体以及城乡不同户籍流动人口消费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模型均可以解释73%以上的样本消费差异, 并且大多数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 证明所选取变量的有效性。

根据表3可看出, 各群体参加社会保险均会抑制消费支出, 相较于农民工, 外来市民参保对消费的抑制作用略大, 具体而言, 农民工参保个体平均消费水平比未参保个体低3.1%, 而外来市民个体间消费差距为4.4%。杨菊华(2011)^[24]的研究表明, 城乡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均显著低于本地人口, 即使外来市民拥有相较于本地市民年龄、学历、技能等方面的优势, 但具有地方保护性质的社会保障福利会更多地惠及本地市民; 此外, 通过描述城乡不同户籍各类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可知, 流动人口参保率最高的险种是医疗保险, 其次是养老保险, 由于样本个体大多为中青年, 这两类保险均需要参保个体在年轻时缴纳保险费, 达到一定时间期限后才可以获得基本保障金。具体来说, 养老保险的保障目的是满足参保个体在老年时的基本生活要求, 同时对于参保人需要缴纳年限满15年的保险金才可在退休后获得养老保障金, 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尚处于较低层次, 工作期间缴纳的保险金相当于直接减少即期收入水平, 从而降低即期消费; 而对于医疗保险来说, 参保人员必须到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购药(一般在参保本地), 而在所调查的参加医疗保险群体中有81.98%的个体在户籍地或其他地方参加医疗保险^①, 由于流动人口较高的流动性, 增加医疗保险异地报销难度, 同样会使参保个体消费意愿降低。

无论是外来市民还是农民工, 收入均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对消费起显著促进作用, 即收入每增加1%使得消费增加0.863~0.872个百分点, 因此提高流动人口消费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其劳动收入的获得。受教育年限对消费也会产生促进作用, 即受教育年限增加十年使得消费提高6%~9%, 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均证实教育回报率会随受教育年限增加而显著提高, 原因在于提升受教育程度会促使流动人口向更高层次的就业岗位流动, 逐步促进流动人口群体从劳动密集型岗位向技术密集型的转换, 收入报酬的提高带动了消费水平的提升。已婚群体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倾向, 已婚群体面临家中老人和幼儿较多的家庭开支, 而未婚流动人口群体需为未来成立的家庭做打算, 有较强的储蓄心理。在全部流动人口以及农民工群体中女性与第一代流动人口群体更倾向于消费, 而在外来市民群体中性别与代际对消费无显著影响。

通常不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比如进入下一个流入地是否会获得目前可以得到的工资报酬, 考虑住房、参加社会保险等问题, 所以相对来说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更加倾向于消费。流动时间的增加也会对提高消费水平略有影响, 流动时间越长使得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工作环境及生活环境更加了解, 预防储蓄心理会放低。另外, 从流动范围看, 流动人口消费开支由市内跨县、省内跨市、跨省依次降低, 流动人口在跨省流动的过程中通常是一个从经济欠发达省份到经济发达省份寻求发展机会的过程, 因此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消费相对保守, 或多或少继续保持原有消费观念, 产生相对于市内跨县、省内跨市较低的消费支出, 并且农民工消费开支均显著高于外来市民。

从流动人口的就业单位性质看, 国有部门较高的工资福利待遇以及社会保障待遇, 使得参与国有部门工作的流动人口消费意愿更强。从产业类型角度看, 从事第三产业工作的全部流动人口以及农民工群体消费开支最高, 而从事于第二产业消费开支最低; 有接近80%外来市民从事于第三产业, 因此在不同产业类型下

① 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统计计算得出。

消费差异显著性较弱。不同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之间也存在显著消费差异,其中自营劳动者的平均消费水平最高,自营劳动者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消费开支项目较多,并且从收入角度看,自营劳动者收入也相对较高,因此产生较高消费水平;而拥有雇员身份的外来市民由于收入局限,这一群体的消费水平最低。另外,从常数项看,由于外来市民相较于农民工来说,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薪酬、福利待遇等方面的获得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外来市民的自发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民工。

综上结论表明:在控制变量相一致的条件下,农民工会产生比外来市民更高的消费倾向或自发消费水平。一方面,可解释为城乡流动通常要比城城流动增加更多的成本,比如交通开支,另一方面,城镇消费示范效应带动了农村流动人口自发消费激增。

表3 均值模型回归分析

变量及模型	基础模型			扩展模型		
	模型(1) 全国样本	模型(2) 农业户籍	模型(3) 非农业户籍	模型(4) 全国样本	模型(5) 农业户籍	模型(6) 非农业户籍
收入对数	0.871*** (547.26)	0.872*** (497.71)	0.863*** (223.92)	0.865*** (157.66)	0.870*** (136.74)	0.850*** (79.39)
是否参保	-0.037*** (-8.28)	-0.031*** (-6.18)	-0.044*** (-4.79)	-0.088** (-1.98)	-0.044 (-0.87)	-0.155* (-1.74)
收入对数* 是否参保				0.007 (1.16)	0.002 (0.26)	0.014 (1.25)
受教育年限	0.009*** (20.59)	0.007*** (14.70)	0.006*** (5.79)	0.009*** (20.59)	0.007*** (14.70)	0.006*** (5.74)
婚姻状况	0.080*** (24.89)	0.086*** (24.40)	0.045*** (5.84)	0.080*** (24.90)	0.086*** (24.40)	0.045*** (5.85)
性别	-0.004* (-1.88)	-0.003 (-1.37)	-0.006 (-1.06)	-0.004* (-1.88)	-0.003 (-1.37)	-0.006 (-1.04)
年龄/代际	0.009*** (3.22)	0.014*** (4.85)	-0.003 (-0.41)	0.009*** (3.23)	0.014*** (4.85)	-0.003 (-0.40)
本地居住意愿	0.082*** (33.18)	0.080*** (30.25)	0.077*** (11.54)	0.082*** (33.16)	0.080*** (30.24)	0.077*** (11.54)
流动时长	0.004*** (18.95)	0.004*** (18.49)	0.002*** (4.39)	0.004*** (18.94)	0.004*** (18.49)	0.002*** (4.37)
流动特征						
流动范围						
省内跨市	0.082*** (31.81)	0.089*** (31.22)	0.047*** (7.26)	0.082*** (31.82)	0.089*** (31.22)	0.047*** (7.29)
市内跨县	0.100*** (30.70)	0.108*** (30.42)	0.056*** (6.64)	0.100*** (30.72)	0.108*** (30.42)	0.056*** (6.67)
单位性质	0.041*** (8.80)	0.046*** (7.99)	0.015* (1.87)	0.041*** (8.80)	0.046*** (7.99)	0.015* (1.91)
产业类型						
第二产业	-0.045*** (-5.78)	-0.042*** (-5.15)	-0.041* (-1.69)	-0.044*** (-5.75)	-0.042*** (-5.14)	-0.041* (-1.68)
第三产业	0.036*** (4.80)	0.037*** (4.70)	0.023 (0.96)	0.036*** (4.82)	0.037*** (4.71)	0.023 (0.96)
工作特征						
就业身份						
雇主	0.029*** (6.57)	0.038*** (7.99)	-0.020* (-1.89)	0.029*** (6.59)	0.038*** (7.99)	-0.019* (-1.81)
自营劳动者	0.075*** (26.11)	0.081*** (26.30)	0.035*** (4.32)	0.075*** (26.13)	0.081*** (26.30)	0.036*** (4.39)
其他	0.054*** (6.29)	0.066*** (6.91)	0.011 (0.57)	0.054*** (6.30)	0.066*** (6.91)	0.011 (0.58)

变量及模型	基础模型			扩展模型		
	模型(1) 全国样本	模型(2) 农业户籍	模型(3) 非农业户籍	模型(4) 全国样本	模型(5) 农业户籍	模型(6) 非农业户籍
常数项	0.015 (1.09)	-0.001 (-0.05)	0.242*** (6.31)	0.062 (1.45)	0.011 (0.23)	0.340*** (3.89)
N	130024	110883	19141	130024	110883	19141
F	2.3e+04	1.9e+04	4038.965	2.2e+04	1.8e+04	3801.585
R ²	0.741	0.731	0.771	0.741	0.731	0.771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数值为 T 统计值。

2. 扩展模型回归分析。扩展模型回归结果在表(3)中通过模型(4)~模型(6)来体现, 首先观察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与收入对数交叉项的系数, 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是否参加社会保险不会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弹性; 而对于流动人口总体以及外来市民来说, 参加社会保障仍会抑制自发消费。相较于基础模型, 其他解释变量对消费的影响效果几乎一致, 从而证明了模型设定的稳健性。

(二) 分位数回归

由于各分位数能全面刻画消费水平, 而且以对数消费分布的分位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能直观体现出各影响因素在不同消费水平上的消费弹性及所影响的自发消费情况, 因此给出两个流动人口群体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且选择 0.1、0.25、0.5、0.75、0.9 这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进行分析。根据表 4,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在任何消费层次上, 收入都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影响流动人口的消费支出。在整个消费分布区间, 随着消费层次不断提高, 两群体收入弹性也在逐渐提高, 即提高收入水平对高消费组的消费增长更有利。最初农民工消费弹性高于外来市民, 但外来市民消费弹性的提升速度快于农民工, 使二者差距逐渐减小, 在中高分位点上二者消费弹性接近一致, 具体来说, 从 0.1 到 0.9 分位点农民工消费弹性从 83.7% 升至 91.9%, 增加 8.2 个百分点; 后者上升幅度略高, 从 80% 升至 92.6%, 整体上升 12.6 个百分点。根据统计数据, 两群体均处于较低收入组, 所以收入对消费的作用尚处在边际消费倾向增加的阶段, 因此在较高的分位数水平上拥有较高的消费倾向。

第二, 根据图 2 可以看出, 城乡流动人口在不同消费层次上参保个体消费水平均显著低于未参保个体, 参加社会保险并不会溢出消费, 并且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上是否参保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波动性, 在消费分布的尾端参加社会保险的不同群体消费差距最大, 在消费顶端消费差距接近一致; 在低消费组农民工参保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较弱, 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 抑制作用先增强后降低, 整体来看, 农民工在消费分布的首尾端参保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大致相同, 在 10% 的最低消费组群体内消费差距为 2.8%, 在 70% 消费组两群体消费差异达到最大为 3.7%, 而到 10% 最高消费组时又降至 2.6%。对于外来市民而言, 在消费低端对消费的抑制作用较明显, 随消费层次的提高, 抑制作用逐渐减弱, 但在高消费组抑制作用急剧增大, 具体来说, 在 10 分位水平参加社会保险的外来市民消费水平低于未参保群体 6.5%, 而到 90 分位时水平降至 3.1%。总之,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对于城乡居民来说不健全, 还未达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对于高消费层次的农民工来说由于参保会增加一部分开支, 会使得他们不得不通过减少消费来平衡收支。

第三, 被访者受教育年限对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并且随着分位数水平的提高, 其促进作用逐渐减弱, 相较而言, 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更有利于提高消费。教育对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可以通过收入来传递, 并且伴随收入水平的提高, 教育回报率存在下降趋势, 而收入直接影响消费, 导致受教育程度对消费在较高分位点上产生略低的正向作用, 更进一步说明提高低消费组的受教育水平更有利于促进消费, 而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可以加快农民工群体由低消费层次向高消费层次流动, 推动缩小城乡户籍流动人口的消费差距。在大多数消费层次上已婚存在消费优势, 婚姻溢出消费在流动人口中表现明显, 这说明已婚群体更容易进入消费阶层, 但当已婚群体已经进入较高消费阶层之后, 继续提高其消费层次的难度将增加, 并且农民

工比外来市民更容易进入高消费层次,具体来说,由婚姻情况导致群体内产生的消费差距,农民工会由0.1分位点的13.5%单调递减至0.9分位点的4.0%,外来市民仅在中低消费层次上表现出消费差距。不同性别的农民工消费情况有显著性差异,并且在中、低消费层次上女性消费心理略强,在中高端男性消费心理略强。在中、低消费层次上农民工群体存在代际消费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消费水平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并且随着农民工从低消费层次进入中等消费层次,其差异逐渐减小。

第四,愿意在本地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在各消费层次上更加倾向于消费,并随消费层次的提升消费意愿逐渐减小。省内跨市、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消费支出均显著高于跨省流动群体,并且随消费层次的提高,不同流动范围的流动人口消费差距缩小,相较而言农民工更倾向于消费。

第五,从流动人口参加工作的单位性质看,参加国有部门工作拉动了各消费层次上农民工消费水平;而对于外来市民来说,仅对高消费组产生显著影响,并且参加国有部门工作的农民工在各消费层次上均比外来市民更倾向于消费。农民工受产业类型差异影响较大,在中、低消费层次上从事第三产业消费开支均高于一、二产业,并在较高分位点上表现出较小的消费差异,具体而言,在0.1分位点从事于第三产业的消费支出比从事于第一产业高出9.2%,而到0.5分位点降至2.9%;除在消费尾端外,在其他消费层次上农民工从事于第一产业消费开支均高于第二产业。在各消费层次上,就业身份为自营劳动者、雇主、雇员的农民工消费开支依次降低,并且伴随消费层次的提高,不同就业身份的农民工之间消费差距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对于外来市民群体,从消费的中低端到中高端水平上,自营劳动者的消费水平均高于雇主与雇员;此外,对任一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来说,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水平均高于外来市民;对于拥有其他工作身份的农民工仍表现出比雇员较高的消费支出,并随消费层次的提高差距减小,而在外来市民群体内两种就业身份的消费开支无差异。

表4 分位数回归模型

变量及模型	0.10 分位点		0.25 分位点		0.50 分位点		0.75 分位点		0.90 分位点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收入对数	0.837*** (218.5)	0.800*** (97.8)	0.865*** (335.6)	0.856*** (147.5)	0.889*** (433.9)	0.884*** (210.1)	0.905*** (483.6)	0.903*** (215.4)	0.919*** (448.0)	0.926*** (202.1)
是否参保	-0.028** (-2.53)	-0.065*** (-3.32)	-0.029*** (-3.95)	-0.054*** (-3.90)	-0.035*** (-5.91)	-0.035*** (-3.44)	-0.033*** (-6.14)	-0.019* (-1.88)	-0.026*** (-4.32)	-0.031*** (-2.81)
受教育年限	0.014*** (13.20)	0.010*** (4.48)	0.009*** (12.13)	0.008*** (4.92)	0.005*** (9.41)	0.005*** (4.05)	0.003*** (5.13)	0.003*** (2.83)	0.002*** (3.46)	0.001 (0.95)
婚姻状况	0.135*** (17.52)	0.093*** (5.65)	0.115*** (22.11)	0.056*** (4.82)	0.078*** (18.90)	0.032*** (3.73)	0.050*** (13.19)	0.012 (1.43)	0.040*** (9.64)	0.015 (1.62)
性别	-0.019*** (-3.32)	-0.008 (-0.63)	-0.005 (-1.22)	-0.016* (-1.81)	-0.001 (-0.17)	-0.009 (-1.39)	0.008*** (2.88)	0.003 (0.50)	0.003 (1.07)	0.006 (0.81)
年龄/代际	0.037*** (5.86)	0.000 (0.03)	0.016*** (3.62)	-0.014 (-1.42)	0.007** (1.99)	-0.006 (-0.89)	0.000 (0.03)	-0.005 (-0.68)	-0.001 (-0.20)	0.009 (1.17)
本地居住意愿	0.119*** (20.65)	0.152*** (10.70)	0.098*** (25.14)	0.097*** (9.60)	0.078*** (25.15)	0.073*** (9.98)	0.058*** (20.42)	0.049*** (6.76)	0.041*** (13.12)	0.028*** (3.52)
流动时长	0.005*** (11.23)	0.002** (2.05)	0.004*** (13.03)	0.002** (1.97)	0.004*** (15.23)	0.003*** (4.86)	0.003*** (14.09)	0.003*** (5.30)	0.003*** (11.33)	0.003*** (4.44)
流动范围	0.123*** (19.89)	0.077*** (5.65)	0.104*** (24.89)	0.052*** (5.40)	0.084*** (25.19)	0.044*** (6.22)	0.070*** (23.07)	0.040*** (5.76)	0.050*** (15.18)	0.034*** (4.40)
省内跨市	0.140***	0.063***	0.120***	0.064***	0.101***	0.060***	0.091***	0.054***	0.074***	0.055***
市内跨县	0.140***	0.063***	0.120***	0.064***	0.101***	0.060***	0.091***	0.054***	0.074***	0.055***

变量及模型	0.10 分位点		0.25 分位点		0.50 分位点		0.75 分位点		0.90 分位点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农业户籍	非农业户籍
	(18.07)	(3.52)	(22.96)	(5.07)	(24.23)	(6.49)	(24.01)	(5.91)	(17.68)	(5.50)
单位性质	0.055***	-0.005	0.050***	-0.005	0.049***	0.015*	0.054***	0.034***	0.040***	0.028***
	(4.36)	(-0.29)	(5.82)	(-0.43)	(7.17)	(1.72)	(8.78)	(3.90)	(5.90)	(2.96)
产业类型	-0.005	-0.051	-0.034***	-0.061*	-0.055***	-0.064**	-0.060***	-0.025	-0.046***	-0.006
第二产业	(-0.25)	(-0.99)	(-2.81)	(-1.67)	(-5.73)	(-2.42)	(-6.83)	(-0.96)	(-4.83)	(-0.20)
第三产业	0.092***	0.045	0.060***	0.029	0.029***	0.000	0.008	0.007	-0.002	0.014
	(5.32)	(0.89)	(5.18)	(0.81)	(3.10)	(0.01)	(0.96)	(0.27)	(-0.23)	(0.51)
就业身份	0.007	-0.062***	0.032***	-0.025	0.045***	-0.008	0.037***	-0.020*	0.037***	-0.007
雇主	(0.71)	(-2.83)	(4.59)	(-1.58)	(8.09)	(-0.71)	(7.23)	(-1.77)	(6.67)	(-0.55)
自营劳动者	0.120***	0.027	0.089***	0.024**	0.070***	0.038***	0.053***	0.034***	0.041***	0.008
	(17.73)	(1.60)	(19.51)	(2.00)	(19.44)	(4.35)	(16.12)	(3.85)	(11.28)	(0.85)
其他	0.083***	0.026	0.066***	0.014	0.062***	0.014	0.053***	-0.021	0.043***	-0.001
	(3.99)	(0.64)	(4.69)	(0.50)	(5.59)	(0.67)	(5.20)	(-1.00)	(3.83)	(-0.04)
常数项	-0.483***	0.100	-0.260***	0.059	-0.043**	0.161***	0.159***	0.245***	0.278***	0.282***
	(-14.3)	(1.23)	(-11.5)	(1.02)	(-2.37)	(3.84)	(9.66)	(5.88)	(15.36)	(6.20)

注：*、**、***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 T 统计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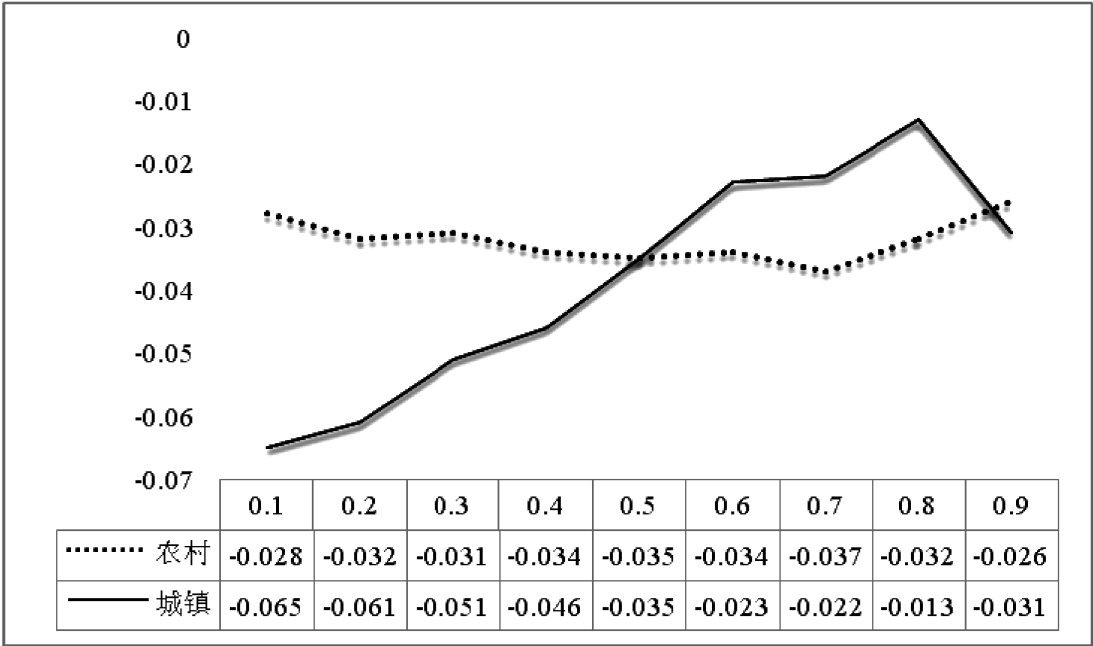


图2 城乡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的影响

(三) 消费差异分解

1. Oaxaca – Blinder 分解。根据表 5 可以看出,城乡流动人口消费总差异为 0.271,表明外来市民消费支出比农民工高 31.1%,其中特征差异为 0.239,占总差异的 88.2%;系数差异为 0.032,仅占总差异的 10.8%。由此看来流动人口内部消费差距主要是由不同户籍个体的禀赋特征差异所引起的,两群体消费倾向差距较小,大部分消费差异可以被解释,可以通过提高影响农民工消费水平的人口自然特征、流动特征与工作特征等缩小群体内部消费差距。

从引起消费差距的分解项看,流动人口的收入报酬是产生消费差距的最主要指标,收入因素带来的消费差异为 0.128,可以解释 47.2% 的消费差异,其中收入特征差异为 0.201,占总差异的 74.2%,系数差异为负,并产生 26.9% 的消费差距,由此看来,由于外来市民自身能力素质的优势,可获得比农民工更高的收入报酬,使外来市民掌握更高的消费自主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两群体拥有同等收入的情况下农民工会产生比外来市民更高的收入消费倾向,因此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更能有效提高流动人口整体消费水平,并达到缩小群体内部消费差距的效果。就总差异来说,是否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总差异产生 3.7% 的负向影响,比重相对较低,通过系数差异对消费差异有负向 4.4% 的贡献率看,在两群体参保意愿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群体更加倾向于消费。由教育引起的消费差距占总差距的 4.5%,其中特征差距占 8.9%,系数差距为 -4.4%,表明由于农民工的农村户籍身份在其享有人力资本投资的过程中处于相对弱势,在获得较低劳动报酬的情况下使消费层次较难获得提升,但若农民工享有与外来市民同等级^①的受教育程度,则会产生比外来市民更高的消费倾向。婚姻状况对消费差距的贡献率较大,两群体中在婚姻状况相同的情况下,农民工消费高于外来市民的 12.2%。性别与年龄因素对消费差距的贡献率较低。

流动特征与工作特征均影响消费差异,但相较而言影响程度较弱,在产业类型变量中,无论是禀赋特征还是消费倾向,农民工均比外来市民有明显高的消费意愿;从常数项的差异可以看出,外来市民群体中具有参照组特征的流动人口,其消费水平高于农民工群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流动人口;根据系数差异中各分解项差异值为负可看出,相比于农民工群体,流动人口中的外来市民群体的消费倾向反而被低估,更进一步说明在禀赋值相同水平的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于消费。

表 5 城乡 Oaxaca - Blinder 分解

变量	总差异		特征差异		系数差异	
	差异值	比例(%)	差异值	比例(%)	差异值	比例(%)
收入对数	0.128	47.2	0.201	74.2	-0.073	-26.9
是否参保	-0.010	-3.7	0.002	0.7	-0.012	-4.4
受教育年限	0.012	4.5	0.024	8.9	-0.012	-4.4
婚姻状况	-0.034	-12.5	-0.001	-0.4	-0.033	-12.2
性别	-0.002	-0.7	0.000	0.0	-0.002	-0.7
年龄/代际	-0.009	-3.2	0.000	0.1	-0.009	-3.3
本地居住意愿	0.010	3.7	0.012	4.4	-0.002	-0.7
流动时间	-0.013	-4.8	-0.001	-0.4	-0.012	-4.4
流动范围	-0.023	-8.5	0.001	0.4	-0.024	-8.9
单位性质	0.001	0.4	0.005	1.8	-0.004	-1.5
产业类型	-0.005	-1.8	0.006	2.2	-0.011	-4.0
就业身份	-0.026	-9.8	-0.010	-3.9	-0.016	-5.9
常数项	0.242	89.3	0.000	0.0	0.242	89.3
总计	0.271	100	0.239	88.2	0.032	11.8

2. Quantile 分解。根据上述 Melly 分位数分解方法,外来市民与农民工消费差距的分解结果如表 6 所示,表中仅报告具有代表性分位点的分解结果,图 3 为第 1 至第 99 个分位点上消费差距变动趋势。整体来说,在整个消费支出区间总差异呈上升趋势的“U”型分布;在中低端位置较小,在高端位置较大,外来市民与农民工对数消费总差异从 0.251 降至 0.231,继而扩大到 0.310,即在 0.1 分位点上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消费

^① 在上文的研究中,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比外来市民低 3.277 年,视为两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差一个等级。

支出高 28.5%,在 0.25 分位点降至 26.9%,而在 0.9 分位点又上升至 36.3%,消费差距并没有因消费层次的提高而缩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消费分层现象,特征差异与总差异变动趋势相一致,并且随系数差异的减小使之对总差异的贡献率增加。关于消费总差异曲线在不同分位点上表现出的变化趋势,原因可能是:在低消费层次上,外来市民和农民工消费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生活必需品开支,因此消费支出并没有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而当消费处于高端位置时,掌握更高消费自主权的外来市民的消费开支自然会高于农民工。由此看来,我国城乡间流动人口消费差距主要在高消费阶层产生。

从分解项看,在任一消费组上特征差异均构成消费差异的主体,即由于农民工与外来市民个人禀赋不同导致两个群体间产生 70% 以上的差异,从 0.1 分位点到 0.9 分位点特征差异值呈持续上升趋势,特征差异在总差异中占比从 73.3% 不断攀升至 95.5%,表明外来市民所拥有的高人力资本始终会促进自身消费水平的提高;而系数差异的影响程度较小,在低消费层次上约解释了 1/4 的差异,随消费层次的提高群体间系数差异逐渐减小,在高消费层次上仅解释了 4.5% 的消费差距。

根据图 3 在反事实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表明:外来市民比农民工在消费方面有更强的主动性,主要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群体内部间存在的禀赋差异,也正因如此在整个消费区间个人禀赋优势始终为外来市民带来正的消费差距,并且对于同样是高消费组的两群体来说,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更加倾向于消费。与已有文献研究的结果不同,在流动群体内部“二元”结构中,仅存在较小的“二元”消费差异,即农民工相对于外来市民来说在个人禀赋相同的状态下,二者消费倾向接近一致,因此会产生近乎相同的消费支出,并且随消费层次的提升此差距逐渐减小。在上文的分析中,无论是在各影响因素对消费均值的影响还是对高、中、低不同消费的影响,农民工相较于外来市民会更加倾向于消费,因此若要提高农民工的消费支出水平应该注重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禀赋条件的提升,即使是农民工存在与外来市民相同的消费意愿,也会由于禀赋特征而仅有较低的消费能力,直接降低其消费水平。

表 6 城乡 Quantile 分解

分位点	消费总差异	特征差异		系数差异	
		数值	占比(%)	数值	占比(%)
0.1	0.251	0.184	73.3	0.067	26.7
0.2	0.240	0.190	79.2	0.050	20.8
0.25	0.238	0.194	81.5	0.044	18.5
0.3	0.238	0.199	83.3	0.040	16.7
0.4	0.242	0.209	86.3	0.033	13.7
0.5	0.249	0.220	88.6	0.028	11.4
0.6	0.259	0.234	90.6	0.024	9.4
0.7	0.273	0.252	92.4	0.021	7.6
0.75	0.280	0.261	93.2	0.019	6.8
0.8	0.289	0.272	93.9	0.018	6.1
0.9	0.310	0.296	95.5	0.014	4.5

六、结论及建议

流动人口群体由于自身流动性特征使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社会保障制度保护,本文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考察在新型“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城乡户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障是否会拉动消费支出增长,并考察群体内部的绝对消费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对两类户籍流动人口参加社会保险与实际消费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相对于农民工来说,外来市民参加社会保险对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大;但两群体是否参保不会对消费弹性产生显著影响。收入作为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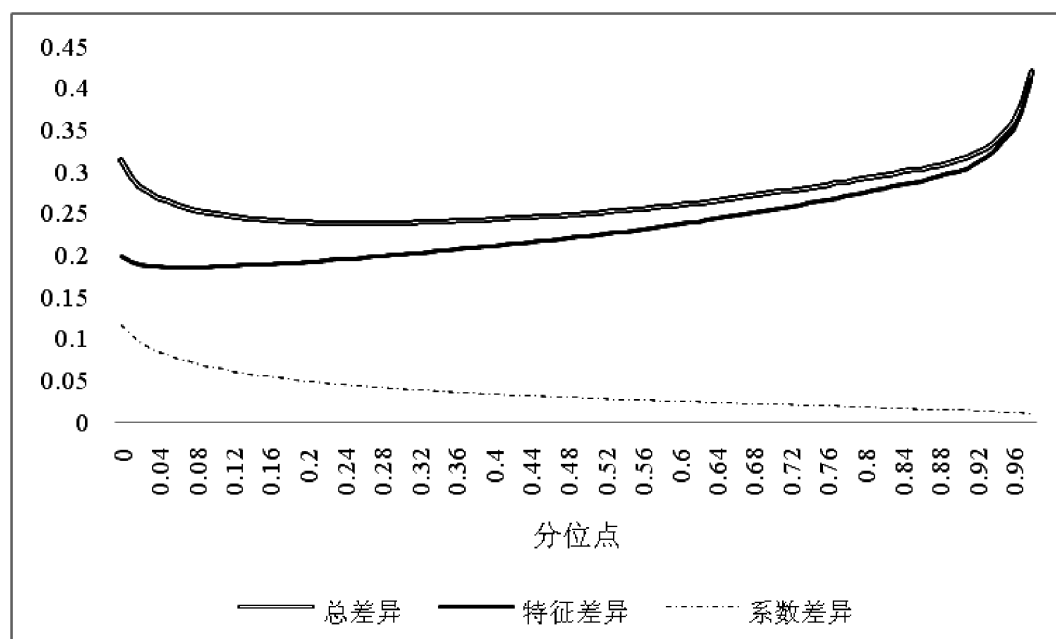


图3 对数人均消费分位数分解

影响因素对消费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提高两群体消费水平的关键在于提高劳动收入报酬。在流动人口跨省流动的过程中,由于农民工群体在往城市迁移时会产生较高的交通费用,并且在消费示范效应的带动下使得农民工的消费支出高于外来市民。农民工与外来市民拥有相同流动特征情况下,农民工更倾向于消费。

第二,在各消费层次上参加社会保险均会抑制消费,并且随着消费层次的提高农民工参保对消费的抑制性波动性增强,而外来市民参保的消费抑制性渐弱;在中高消费层次上,参保群体中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更加倾向于消费,而在中低消费层次上影响效果恰恰相反。提高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加大对农民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有效提高消费水平,更能缩小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消费差异。

第三,通过对流动人口群体内部均值消费差异进行分解可看出,农民工自身禀赋的劣势地位是产生总差异的主要原因;收入作为主要影响因素扩大消费差异,并且两群体间平均相对收入水平构成消费差距的主体;外来市民群体中具有参照组特征的流动人口,其消费水平高于农民工群体中具有相同特征的流动人口。

第四,为全面考察在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消费差异,建立在分位数回归基础上的分位数分解结果表明,城乡消费分层现象明显,外来市民比农民工消费支出最多可高出 36.3%,其中,由禀赋差异导致的特征差异始终占主导地位,在低消费层次上特征差异占据总差异的 73.3%,然而当农民工进入高消费层次时,并没有改变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弱势地位,由于禀赋特征的相对劣势使特征差异更加显著,占据总差异的 95.5%;两群体间消费倾向差距甚微,在保证影响消费的各因素禀赋值相同的情况下,两群体消费差距并不明显。

在当前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管理制度下,流动人口消费稳定性较差,社会保障获得相对不足,因此使得流动人口群体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心理,消费意愿不足。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社会保障的目的是通过增强参保者应对未来风险的抵御能力,进而通过提高未来预期可支配收入,替代储蓄以提高消费水平,而对于在任何消费组的流动人口来说参加社会保障均会降低消费开支,因此亟须改善我国现阶段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统账结合制度中的转移支付,增强参保者面对未来风险的抵御能力,增强参保者参保信心,释放消费潜力。

第二,特征差异是造成流动人口群体内部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提高流动人口整体的个人禀赋条件,尤其是针对农民工群体,收入水平、受教育年限等均会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收入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受教育程度,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户籍人口的受教育意愿也在不断增强,同时政府应促进形成农民工及其子女就业机会公平化、教育机会均等化的社会环境。

第三,改革户籍制度。在低消费层次上,农民工与外来市民在个人禀赋相同的情况下消费支出有接近 20% 的差距,这是由农民工长期以来保守的消费环境所致,使他们倾向于储蓄。

第四,关注流动人口的收入分配,改善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尤其是缩小高端位置的收入差距。因此在健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上提高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素质与改革户籍制度是释放流动人口消费潜力的关键,在流动人口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会带动整个经济体的消费能力。

参考文献:

- [1] 王亚菲,王瑞,徐丽笑.国内大循环背景下流动人口消费潜力的经济效应测度[J].中国人口科学,2022(4):74-87+127-128.
- [2] 王秀芝,孙妍.我国“迁移谜题”的成因:一个文献综述[J].金融教育研究,2018(5):64-70.
- [3] Meng X.. Does a Differen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ffect Migrants' Access to Basic Public Health Services in Chin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9(16):4615.
- [4] Huang Y.,Liu W.,Zhuo Y.,et al. Social Insurance Participation and Urban Settlement Intention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J]. 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2020(8):2366.
- [5] Smyth R.,Nielsen I.,Qian X.. What Determines Employer Willingness to “top up” Soci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Shanghai's 25 Plus X Schem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2009(9):512-528.
- [6] Chen B.,Lu M.,Zhong N..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 [J]. World Development,2015(6):133-146.
- [7] Chen X.. Why do Migrant Households Consume so Little? [J]. China Economic Review,2018(6):197-209.
- [8] 王美艳.农民工消费潜力估计——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系[J].宏观经济研究,2016(2):3-18.
- [9] 杨菊华.城乡差分与内外之别: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研究[J].人口研究,2011(5):8-25.
- [10] 于潇,陈筱乐,解瑯卓.流动效应与户籍歧视效应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J].人口研究,2022(2):61-74.
- [11] 于潇,孙悦.城镇与农村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基于 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分析[J].人口研究,2017(1):84-97.
- [12] 郭菲,张展新.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J].人口研究,2012(1):3-14.
- [13] 郝演苏,周佳璇,张建伟.医疗保险、市民化与农业转移人口消费[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1):91-104.
- [14] 邓大松,胡宏伟.流动、剥夺、排斥与融合:社会融合与保障权获得[J].中国人口科学,2007(6):14-24+95.
- [15] 范黎波,杨金海,黄钰婷.社会保障提升能有效促进居民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与反事实分解方法的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7(3):49-59.
- [16] 杨菊华.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人口学刊,2011(5):3-15.
- [17] 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07(6):33-41+95.
- [18] 樊士德,费振东.劳动力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J].金融教育研究,2021(4):30-42.
- [19] Gary S.,Becker..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 [20] 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36-46+205.
- [21] 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城市外来人口社会保障缺失——来自上海等五城市的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07(6):33-41+95.

- [22] 秦立建,王震,葛玉好. 城乡分割、区域分割与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缺失[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3):103-112.
- [23] Oaxaca R. . Male - Female Wage Differentials in Urban Labor Market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73(3):693-709.
- [24] 杨菊华. 城乡分割、经济发展与乡 - 城流动人口的收入融入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5):3-15.

Does Social Security Promote The Consump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under the New “Dual Society” Structure?

MENG Xue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the Oaxaca - Blinder decomposition and Quantile decomposition were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dual society” structu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ecurity particip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gister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is investiga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among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will inhibit consumption,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t different consumption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within the group, and the consumption gap i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with the increase of consumption level. Obviously, the difference i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group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in consumption, and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gap in consumption,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ce in characteristics will gradually deepen. Therefore, if we want to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narrow the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groups,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my country'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and quality training of migrant workers, improving their endowment level, and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 rural integration on this basis.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Consumption gap; Social security; Quantile regression; Difference decomposition

(责任编辑:罗序斌)